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抗拒遗忘】	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严家祺
【时事评论】	毛泽东之“梦”：复活的氛围	丁学良
【史海钩沉】	聂元梓与安子文“特务电台发报案”	余汝信
【往事非烟】	文革秘密准备中（选载之一）	唐荣智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抗拒遗忘】

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序一）

• 严家祺 •

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埋葬后，近五年来，文革的幽灵却悄然地掀开北京地底的狭小裂缝，像一股地下旋风一样，升向空中，并蔓延到中国各地。

五十多年前的六月一日，从毛泽东宣布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起，文革像疾风骤雨一样，在一天中狂扫了中国大地。这一天，中国就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在这之前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弥漫的“旧时代”，从此以后，“新时代”就要在文革中降临。

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就这样做了。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正如王复兴在《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一文中所说，引爆文化大革命有两大要素，一是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之激化”，二是号召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反对派。在1966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

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后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3事件”，直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后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1966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后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着报复之心向当时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开刀。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物极必反。被毛泽东推向极端的经济制度，必将走向反面。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是对文革十年的“反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走到了绝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毛泽东没有说错，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邓小平又继承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一党专政。

文革结束后，被打倒的当权派一个个恢复了权力，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子孙后代，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对文革反动的最大后果，是江胡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5000年中国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国，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用权力控制市场、渗透市场、垄断市场，从而使极少数权贵掌握了中国大部分财富，两极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现代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有“良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良好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实体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用政府权力和金融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三是市场经济和与

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四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用经济办法保障社会公正。权贵资本、权钱交易、金融掠夺、严重的两极分化都是坏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欧美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批判的“老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1848年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11·9”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就开始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在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中国今日资本主义弊端发生的原因，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文革有四大要素，一是反资本主义，二是反官僚压迫，三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四是强化个人独裁。现在文革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对中国来说绝不是福。改变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依靠毛泽东热、提倡个人崇拜、动员民众、唱红打黑，是第一种途径。遗憾的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许多人只有文革记忆，找不到其他思想武器来改变中国现实，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厉行法治的前提下用经济政策来解决。

文革时代，是一个红色与黑色、理想与崇拜、造反与屈辱、残暴与苦难交织的时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见证，正如王复兴所说：“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十七年到50天，始终贯穿着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而文革的幽灵、专制的阴魂至今未散。不论是北大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北大文革影响全国，北大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年轻一代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记录，这有助于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有助于实现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人人权利受到保障的中国的伟大目标。

2018年1月写于华盛顿近郊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主编：王复兴

~~~~~

## 【时事评论】

毛泽东之“梦”：复活的氛围

• 丁学良 •

(一)

在2017年年尾至2018年年首的数月里，如果阁下有机会到中国内地周游一圈，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私下交流，便会有一个沉重的话题不断被提及：眼下的大陆越来越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气味，文革是不是真的要再回潮一次？

笔者自从1993年夏时隔十年第一次返回内地以来，已经有过三次听到人们议论文革是否会再来的忧虑，比如1999年下令发动全国各地扫荡法轮功的高峰阶段，更记忆犹新

的是薄熙来任职重庆搞得红红火火的那段时期里。可是，像眼下有那么多不同背景的人都在作此议论，而且举出好几条颇有份量的证据，却不能不令笔者严肃对待，不敢一笑置之。毕竟，这些人举例的内容是众人目睹的鲜活事件，不仅规模可观，同时蕴涵深厚。

#### ◇ 几大事例隔代呼应

北京市政府从201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驱赶外地“低端人口”的举措，就非常类似于1968年发起的驱赶城镇居民下乡的运动。该年9月底，兼任《甘肃日报》军管会组长的一位部队高官组织采访的报道里引用了会宁县老农王秀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的一句话：“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突出这句豪言壮语的报道随后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该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转登了这篇报道，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的“市”字，是毛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参阅《老年生活报》2006年11月27日张友琴短文）。于是，全国城镇马上把千百万无常规职业的居民，连同红卫兵一道，驱赶至乡下种田。时隔49年的两大清理运动的原因都是政府把城市的包袱一脚踢走，拒绝承受对“低端人口”的就业和福利负担——北京市政府表示，全市2170万居民中有810万外来人口，造成了巨大压力——但都是借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运用强制手段剥夺民众的基本人权（张淑伶：“回顾半世纪前中国人口大移动”，中央社驻上海特派员专稿，2017年12月27日）。

也是在去年年尾，内地党组织和很多机关特别是学校，发通知告诫党政干部乃至严词命令学生群体不要欢庆圣诞节，“不参与宗教活动、抵制腐朽文化”。刚好时逢“毛诞”即毛泽东生日，于是乎是“崇洋”还是“崇毛”，是庆“圣诞”还是庆“毛诞”，上纲成政治态度和文化认同的选择。这又使内地知识界回想起文革中“破旧立新、过革命化春节”的红色风潮。

更敏感的比较，涉关“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变迁。毛从1960年代初开始，日益表现出对于“中央一线（刘少奇邓小平）和二线（毛）领导”安排的不满，最后演变成文革的翻盘斗争，一举废弃了高层权力相对分工的体制，全力锻造“一元化”的极端集权架构。用林彪最生动的语言表达，就是：“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要一元化。……我们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林副主席讲话》，无出版机构，第50—51页）。邓小平自1978年开始，反复批评这种体制，然后才有了党政分工、政企分家等一系列的重要革新。可是，近来北京越来越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日常的经济事务管理。内地知识界如今人人耳熟的一句毛语录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 ◇ 细考毛泽东之“梦”

因此之故，无论诸位的观点如何，都不能不正视内地知识界的沉重提问：“文革再来一次的气氛日浓，这意味着什么？”此一提问对香港同样含义沉重，因为如今的香港和1966—1976年间的香港大不一样了，与内地之间不再有政治上“井水不犯河水”的截然分隔。笔者基于对文革的教学研究（在香港就教研了十几年），外加亲身经历的感受，从两组要素及其延续和演变来试图回应上述提问。

第一组要素是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愿景，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梦”——既关乎中国本身应该怎样，也关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怎样。这组要素的延续和演变是把毛时代的梦对比于

本时代的梦。明白了二者的深层异同，也就明白了“文革再来一次”问题的大半。众所周知，毛这位超级革命家平生最后的梦和他排除万难大搞文革一脉相承，笔者整理了毛的文革梦内容，包含以下的关键点。

第一点，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究竟是哪些？这个问题旨在让大家尽可能把毛的个人权力至上考虑、个性里的偏执狂和被谋害恐惧心理这类动机，与那些看起来更合理的动机作综合平衡的分析，诸如：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的忧心重重，因为苏联共产党已经“背叛革命”了；对中国社会里的商品经济元素和市场力量增生（即毛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译自 bourgeois rights）的高度警戒等。

第二点，毛文革中号召群众批斗党政干部、“吐故纳新”即大规模整党，显示出他对执政党的革命意志日益衰退极度不满。毛的思路和做法，是否也受到了1949年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推行的改造老朽国民党做法的影响？这个问题旨在把现代中国最主要的两大政党的命运作比较，以深化对政治权力与政治衰败之间关系的透视。败退的国民党甚至提出了“毁党造党”的激进口号，终于体认到在大陆执政期间该党的自身素质越来越差丢了天下。假如撤到孤岛后不再大力整顿自己，很可能连台湾也掌控不住，那就是“死无退路”了（蒋介石语）。蒋领导层提出“毁党造党”的口号，目的是“永葆党国”，这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提出的“毁党救国”、“毁党建国”有本质区别（“胡适致雷震”，载万丽鹃编注：《万山不许一溪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2001年版第115—116页）。但公平而论，若无1950年代发动的“毁党造党”运动，国民党继续像在大陆时那样松松垮垮、懒懒瘫瘫，它对台湾的统治绝不会那么稳固有效。终身密切关注国民党军政作为的毛，对此一定不会没有联想、毫无触动。

#### ◇ 和商业都市成反比的蓝图

第三点，毛心目中理想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反复探索的意义丰富的社会科学和伦理学大课题，至今不衰，尤其是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家群体里面。中国的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毛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信”即简称的“五七指示”，里面毛对他所期望在中国建成的好社会有比较明白的表述（详见《人民日报》刊载的文本，1966年8月1日第1版）。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在多篇评论和回忆录里，对毛的乡土版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有生动描述。笔者在明太祖的治军治国措施里，也看到诸多极可能被毛借用了的要素（参阅聂作平：“安顺屯堡：在这里，发现明朝”，广州：《同舟共进》，2017年第9期第72—76页）。人们皆知毛平生以秦始皇为样板，其实毛对朱元璋的学习和继承也是多面且深入的。

毛“五七指示”描画的社会蓝图经常被海内外华人研究者回溯到中国传统中的“五斗米道”、“大同书”、太平天国之类的农民社会主义愿景。正如 R. A. Stein 的历史性考察所显示的，自从汉朝以降，中国历代的“政治宗教运动，都曾试图依据‘太平’的原则，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实现往古的理想社会”（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 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95—796页）。毛的文革当然不例外，文革结束后内地知识界一再把毛的社会蓝图贬称为“小农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毛派理论家对此异常恼火。

除此之外，笔者还注意到毛的好社会蓝图其实也有某些和犹太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古老文化中的社团（香港称为“信徒团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类似的元素（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4页）。而对工作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商业都市的人们来说更有启发意义的

是，中世纪穆斯林军队征服巴尔干半岛以后，有意损毁那里的城市此前作为国际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发达自由多元功能，仅仅把城市变成统治集团官员的居住地和军事堡垒，由此导致那些原本繁荣的城市后来没有发挥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作用。意大利的几个城市恰恰起到了这种划时代的作用，于是文艺复兴和近代资本主义就从意大利起步了（W. S. Vucivich:

“The Nature of Balk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Slavic Review*, December 1962, pp. 603—614; 阅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卷第8章）。这个情形和文革中毛下令的反都市化政策很有可比之处，更是与后文将重墨点评的香港和“文革再来一次”的疑问挂钩。

## （二）

整理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呈现出的他本人之“梦”的内容，需要关注的第四个问题是，毛的“五七指示”里有他的“未来社会愿景”，但并没有讲到新型政治权力的详细安排。有很多的文革经历者和毛主义分子一直声称，毛发动文革是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实行巴黎公社一样的劳动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普遍民权，较为接近于香港最著名的民主主义者之一“长毛”梁国雄所提倡的那种彻底摆脱官僚统治的草根直接自治类型。最核心的证明毛确实具有“民权初衷”的文献，就是1966年8月8日毛亲自主持通过的中共中央指导文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规定：文革中的新型政治权力机关“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然而，当上海市于1967年“一月革命”中创建按照毛设想的新型权力机关“上海公社”的时刻，宣言草案中重复以上的规则，却被毛指令直接负责控制上海文革进程的张春桥统统删去，随后毛拍板允准改过的宣言里，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顿时烟消云散（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上卷第809—812页）。所以，普选制在当代中国，从来就是海市蜃楼。如果我们以毛亲自指导下成立的上海革命委员会作为他“梦”里的新型政权模式，那就不得不基本上接受当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其意识形态主导是Mikhail A. Suslov 苏斯洛夫）为之选定的标签——“军事官僚专政”。

第五个问题，毛泽东究竟想选择谁作为他的接班人？这件大事在所有文革研究里，都是头等眩惑的疑问，因为毛搞文革的首要目的，便是废除集体领导制，把个人拍板制推向顶峰。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把个人独裁体制中最高权力交替的超级难度和风险，放在比较政治社会学的宽广视野里考察。从斯大林和他挑选接班人的警示开始（即毛文革前和文革中反复告诫的“赫鲁晓夫教训”），继而把目光集中到毛和刘少奇、高岗的关系上——这些是文革的序曲——然后是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甚至延伸到江青和毛远新（Minnie Chan, “Shock Waves from Lin Biao Plane Crash Still Echo in Lead-up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Reshuffle”, *SCMP*, 12 September 2016）。因为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可轻视的解释：毛晚年的安排是为了一步一步步地、曲曲折折地铺垫到毛自己家的成员最终接自己的班。这在东亚是屡见不鲜的操作，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还是中间派的政权体系。蒋（介石）家、李（光耀）家、金（日成）家都成功地做到了，毛家为什么不能努力试着做？

第六个问题，文革是否开辟了一条在中国整治贪腐的有效途径？这个问题自从1990年代后期以来每年——至少直到两三年之前为止——都激起公众的浓烈兴趣，因为内地的贪污腐败与时俱进，表现形态和涉案金额都是日新月异。大家必须把文革之前和文革式的反贪腐做法，和20世纪中期以后其它方式的整治贪污腐败作对比，包括议会民主制度下、军事独裁制度下、政教合一制度下、传统君主制度下，殖民主义制度下，等等，看看各种方式的

成本代价及其短时段和中长期的效果。凭借这个背景，我们才可能对当今中国内地的其它反贪腐方式，有冷静的观察和鉴别。

第七个问题，中共文献以前一直用“十年浩劫”来界定文革，时过境迁，站在目前的高度上回顾反思加展望，人们是不是认为文革在造成巨大灾难的过程中，也有其正面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有，是哪些？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和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运动的一位观念导师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反思出于同一个逻辑。也是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法国学生运动结束11年之后，马尔库塞大声对媒体说：“把1968年事件说成一场失败是愚蠢的”，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法国事件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采访发表于刊物Match, 23 March 1979）。而笔者提出此一问题是基于很多研究者和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一再争辩：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有其主观的目标，但是一旦全民被发动起来以后，文革的进程就往往不是完全掌控在最高领袖的手里，于是有些元素就发挥了“钻空子”、“打着红旗反红旗”，或“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这类歪打正着的非预设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经常被提及的政治领域里归功于文革的正面元素和后果包括：青年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大增，民众的自组织和自动员能力提升，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按照民主原则做事的经验提升；还有经济和社会层面的（这些更具争议性），比如上山下乡带来的偏远农村地区教育的改善，农民医疗得益于赤脚医生，乡镇开始发展初级加工业，等等。这些元素和人们当今焦虑的“文革再来一次？”内在密切相关。

第八个问题，能不能说“没有十年文革，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得益于比较社会主义体制的观察研究。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有些外国学者就论说：邓小平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大彻大悟（今天看起来更显得是如此），决定性的来自于他们本人及家属在文革中的苦痛遭遇。若无文革把中共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那些体制和政策折腾得乱七八糟，也许中国就和苏联一样，在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步步延续下来。可是十年文革这种翻天覆地的冲击，令那套传统体制没办法照常规支撑下去，改革开放于是就成为高层的明智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率先走出一条不同于它的姊妹国家的半资本主义道路、主动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功不可没——物极必反。

第九个问题，缺乏强韧法治体系的政党或政权内部进行严酷的清洗——不论用什么术语去称谓，比如说“吐故纳新”、“党内斗争”、“争权夺利”、“窝里斗”等等，并不是中国的独家传统。仅仅就执政的共产党体制的范围里看，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红色高棉短短的几年在台上、朝鲜自从1940年代后期至今，皆有类似现象。但是，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来进行这样的清洗，至今唯有在毛泽东统治的最后期。那么，这些中外党政军体系内部的“吐故纳新”的相同和相异是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所有以上诸问题的精髓。

以上的九个大问题都是浓缩过的，每一个都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子问题，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包括笔者本人也无法解答很多读者和文革课堂里学生们提出的相关探讨。香港的大学生们十几年来，每年都抱怨上笔者的文革课程要读那么多的中外文书籍和数码资料库文件（即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发行的全套资料库），还有好多具体问题解答不了。首要的原因是至今有关中国文革的最核心原始资料，一直没有对外开放。海内外众多中文报刊杂志在2008年11月底，兴奋地报道了“北京的文革档案将于今年底向公众开放”。大约一个月以后，在香港注册但可以在中国内地发行的《凤凰周刊》，宣告“中国大陆文革档案暂缓开放”。当时笔者在北京，研讨会上学者们感叹，“暂缓”到何年何月，只有天知道！到了如今，更没有丝毫迹象会发生这样的公开档案的大好事。

香港虽然几十年里一直是全球有关文革的中文资料的出版发行重镇，然而至今我们也没有见到，文革最重要的领导者、牺牲者和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曾经发表过文革的回忆录。但所有这些不足之处，并不影响我们把以上整理的毛泽东之“梦”的大致内容，作为对照的一面镜子，再把当今的“中国梦”之官方版呈现的内容，作为另一面镜子，仔细看看这两面镜子之间，互相反光折射到了何种细微的程度。正如在本专栏上一篇评论里所说的，经过这样的对照，从两组要素（两面镜子）及其延续和演变，我们才可能理性地回应那个“文革是否再来一次？”的沉重提问。

### （三）

现在笔者把前两篇讨论的毛泽东之梦作一总结，可以把其中的诸多要素归纳成三大单元。第一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社会”，第二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第三个大单元是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三大单元的构成要素是我们展望未来的出发地。

#### ◇ 非同寻常的中国社会

先看第一大单元：此处的“中国社会”是广义的，包括经济和文化教育领域。在毛的设计图里，理想的中国社会是全民皆兵、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对毛泽东之梦的这个部分，林彪把握得最贴切，所以从1960年代初开始，林就反复宣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解放军，人人都要像士兵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中共中央批示，1960年12月21日》。丁按：这是毛对该年10月20日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高度赞成和全面推广）。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的试验，早在1958年大跃进初期已经着手，经济的崩溃使之半途而废。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该试验又被提上桌面，“五七干校”、“大寨样板”、“大庆样板”等都与之相关。全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其物质基础当然是指令经济，所以它应该被视作“军事共产主义”体系的落实。中共执政后毛一直试图把国民经济推向这个轨道，考虑以配给制取代工资制，却因预算太高未能付诸实践（参阅毛亲笔点评和推荐的张春桥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文革中毛多次告诫：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让它无限期实施；商品经济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必须予以限制。指令经济下的中国当然无法和世界贸易体系连通，所以毛督促全国“自力更生”。至于文化教育领域，毛更不想中国交流外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西方），还是修正主义的（苏联东欧），都必须彻底扫除其影响。

当今官方版的中国梦里，有多少上述“毛梦”的要素呢？让全国人民服从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显然是历届政府都愿意做到的。不论是以“维稳”的名义，还是以“平安中国”的名义，更遑论眼下国际上议论纷纷的“数码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的管控模式，都旨在把民众的言行约束到整齐划一的程度，虽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灵活性有些差别（Samantha Hoffman, “Managing the State: Social Credit, Surveillance, and the CCP’s Plan for China,” JamesTown.org, 17 August 2017）。在文化教育领域里阻隔外国的影响，当今的中国梦里只有一半的“毛梦”，即反对“普世价值”。教育上中国关不住大门，作为全球外派留学生总量第一大国的地位，延续已久，还会保持多年。实施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当今延伸下来的只有其中一块，即关系到强军的战略资源和保证政权永固的支柱产业。换言之，“国计”的一块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延伸，“民生”的不再是。



小结：“毛梦”里的中国社会设计，连接到当今中国梦里的要素，尚不及一半。即便未来十年形势更为严峻，也不会超过一半。我们只要把毛的“五七指示”等文本和毛的几次试验与当今中国社会两相对照，以上判断就能站得住脚。

#### ◇ 中国全面对抗世界

再看第二大单元：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自从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日益强化的一个信念，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可避免地从莫斯科转向北京，毛是共产主义谱系的第三座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是第一座，列宁斯大林是第二座）。1960—1970年代毛力主输出暴力革命，号召美国黑人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大本营，林彪把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上升为全球革命道路、即第三世界包围第一世界实现世界一片红（“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都是毛努力实现其颠覆世界梦的亮点。

尽管当今“中国威胁论”四处冒烟，但几乎没有严肃的观察家评论家认为北京正在输出暴力革命。中国目前和外部世界发生纠纷的，主要是源于这些：输出产品或产能、输出发展模式包括环境污染、输出资本、输出大外宣、输出治理模式。这几种输出也令很多老外担忧，但它们不同于暴力革命的输出，后者是要推翻“帝修反政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掀起多年的战火和流血；前者则主要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是你输我赢的竞争（“我们为何不应学习中国模式”，《新苏黎世报》2018年2月5日评论，DW中文网同日翻译转载）。未来十年或更长时段里，看不出中国会朝世界革命的道路迈进。中国当今的这些做法，一大半是从西方学来的，是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许多发达国家都做过，如德国和日本（Joshua Aizenman and Rajeswari Sengupta, “Global imbalances: Is Germany the new China? A sceptical view”, VoxEU.org, 5 October 2010）。最关键的是：当今中国的这些做法，是尽力在国际市场体系里多占好处，而不是摧毁它，像苏联阵营那样以社会主义贸易体系取而代之。目前中国最高层每天向世界大声呼喊的，是要推进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 ◇ 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度集权之后

最后看第三大单元：中国的政治体制。“毛梦”里面的几大单元，在毛生前就数这个单元落实得最给力，用林彪的话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批示》，1966年9月22日，发至县、团级学习文件，笔者学习后收藏）。毛毕生造就的这种政治体制，对后人影响巨深。哈佛大学商学院1990年代后期曾经在中国大陆对工商界中上层做过一个实证研究，发现他们最向往的领导体制即最想仿照的，就是毛模式，不论他们是否在毛时代挨过整受过苦，也不论他们是国企主管还是民营老板。有了这个普遍性的背景，我们对内地这几年日益强调权力集中再集中的趋势，就不该惊讶了。

综合来看，毛泽东之梦和当今中国梦的关联程度，以第二大单元最弱，第三大单元最强，第一大单元居中，这种整体格局对我们的未来意味深长。公众注意力显然一直是聚焦于第三大单元，恰如今年3月初北京“两会”前后的万千报道和评论所示。由于关注点一直偏重于此，无数人就担心中国不久“文革会再来一次！”笔者却不作这样的判断，理由简述如下：当今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无法借助“全民皆兵、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的毛式中国社会结构来实现，更不可能借助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两个阵营、你死我活斗争”的毛式全面对抗来完成。以“两个一百年”为时间框架的中国梦若非全盘落空，至少三种运行机制是必不可

少的——持续造富的国民经济，哪怕这个经济体里面充斥不公正和不平等，哪怕多位企业家个人的下场是个悲剧；持续注入中国经济的创新元素，不论是经由留学渠道或人才引进或专利购买或技术窃取；持续提供给中国巨量产能及产品对外输出的渠道，不论是通过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或是通过一带一路之类的国家资本主义大手笔操作。这三种运行机制可以在一个更自由的政治体系里更有效地起作用，也可以在一个更强制专权（Hard-authoritarian）的统治体系里以更高的成本起作用，但它们绝对不可以在一个原教旨主义环境和极端主义体制（文革期间便是这种综合状态）里挣扎生存。

◇ 有理由保持艰难和顽强的乐观主义

笔者坚信，当今的中国梦之落实，必须依赖企业家阶层、国际贸易商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尽管北京顶层不会让他们把自己的行业资源和专业能力转换成对党国权力体制发出挑战的手段。香港未来之生存发展的空间与局限也与此一脉相承——这三个阶层是香港社会的支柱群体，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世代竞争形成的，难以被替代取消。他们活动的“天花板”早先（1997年之后的十多年）是玻璃做成的，而现在越来越换成是钢板材料的了，明摆在那儿，不许去碰撞。只要不去正面碰撞，就不至于摧毁你。

有些读者或许要问：为什么当今的中国梦不至于全方位对接毛泽东之梦？为什么第三大单元再趋强化，也不会演变成文革全盘回潮，决不会主动毁掉上述的三种运行机制及它们的三个操作阶层？这组问题已经超出了政治社会学的经验讨论范畴，进入到宗教学层面，比政治哲学更加形而上，只能留待以后再作诠释。

（全文完）

□ 来源：香港《信报月刊》，2018年1、2、3月号连载

~~~~~

【史海钩沉】

聂元梓与安子文“特务电台发报案”

• 余汝信 •

2017年10月，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署名聂元梓的《我在文革漩涡中》一书，此书可视为聂元梓的第二本纸本回忆录。

《我在文革漩涡中》共959页，其中真正属于聂元梓本人的回忆部分392页，占全书篇幅的41%，其余567页为文献和附录，占全书篇幅的59%（对于一本回忆录来说，该书正文与附录部分的份量其实有点儿本末倒置）。与2005年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首版纸本《聂元梓回忆录》相比较，新版回忆录删除了聂到北大前的经历部分，同时删除了旧版回忆录第七章“小家庭骤起大波澜”全章。

本来，聂元梓的新版回忆录编著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而对旧版回忆录的增删，都是其应有的权利，外人毋庸置喙。惟我们需要指出且可以评论的是：新版回忆录将旧版中的第七章全章删除，致使新版中“与康生、曹轶欧的纠葛”一节严重失真，缺失了文革初期聂与康生、曹轶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

关于这重要一环，让我们重温一下聂在旧版回忆录中是怎么说的吧。

## 一、聂元梓称“这个女人不寻常”

在“小家庭骤起大波澜”一章中，聂元梓称，“1965年的深秋，我和老红军干部吴溉之结了婚。”“当时，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安子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经常到吴溉之家里去，有时候在一起聊天，有时候几个人打打麻将。”“安子文来打麻将，经常带个女的，叫邓觉先，她妹妹叫邓觉慧，也是常来常往。”

聂又称，“邓觉先的丈夫叫张仲瀚，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担任领导工作，后来我们也认识了，他很好。”

这里，聂元梓搞错了！邓觉先的丈夫不是共产党人张仲瀚，而是民主人士张振汉。聂的第一本回忆录曾经过笔者的过目修改，惜笔者当时也未能觉察聂元梓在此其实是摆了一个大乌龙！

直到2009年后笔者才得知：

张振汉，1893年生，江苏徐州铜山人。职业军人。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4月23日任国民革命军第41师师长。1932年与邓觉先结婚。1935年4月授中将衔，6月在湘鄂西围剿红军，在忠堡之战中负伤被俘，参加红军，并任红军学校战术教员，随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抗战爆发后回到国统区，1943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1945年11月至1947年4月任江苏连云港市长。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历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湖南省政协常委，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6年秋，张振汉、邓觉先及儿子张天佑一家三口离湘北上，1957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安排下住进了北京西城丰盛胡同38号宅院。1965年初搬到了西四北三条报子胡同里的小绒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1）

聂元梓接下来称：

交往多了以后，我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讳。比如说，安子文身为中央组织部领导，人却经常在邓觉先家里，中央组织部派人找安子文，要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就到邓觉先家里找，一找准能找到。安子文要出差，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他出差回来，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安子文出差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邓觉先都知道。要了解安子文的事，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就找邓觉先，问邓觉先，准能知道。有时候，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管干部，是党的要害部门，有时一些老同志找他谈工作，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邓觉先，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安子文的有关意见，有时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

其它的人我不多说，吴溉之自己，爱人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一个人生活，孤单得很，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调到身边来，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要安子文帮忙。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三天两头就凑在一起，两个人的办公室也挨得近，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却先和邓觉先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这样的情况一再地发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了。吴溉之这个人不在乎这些事情，即使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他也不放在心里。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对他的事见怪不怪，我却觉得不可思议。你安子文是党的中央组织部领导，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人去

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的干部工作，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邓觉先年龄不算小，自称五十岁了，经常打扮得很漂亮，抹着红嘴唇，穿的也很时髦，这在当时都是让人反感的。党的工作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来做？

我和他们渐渐熟悉以后，安子文和邓觉先的暧昧关系就不在乎我了。我眼中的怪事就更多了。有一天，几个人约好上邓觉先家里打牌，吴溉之一时去不了，要四点钟才能到，吴溉之就让我先去。安子文和他的夫人刘某某，邓觉先，加上我，正好一桌。我们四个人就坐一辆车子去了，我坐在前面，他们坐在后面，三个人在车上嘀咕家里的什么事情，开始我没有太注意他们说什么，后来就听到刘某某发脾气了，她说：“这个家我管不了，你让邓觉先管吧！”没有想到安子文竟然回答说，邓觉先你就管吧。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刘某某是完全明白的。

.....

随着了解加深，我对邓觉先产生了怀疑。她自己在测绘局工作，管管资料，上下班都很自由，生活条件很优越。她有什么必要这么繁忙地在这些党政要员的圈子里活动，与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周旋？而且，她和安子文的关系搞到这种地步，几近于公开？

这段时间，有一位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名字我记不清了），也和我讲了很多关于邓觉先的事。他说，他经常开车拉着她跑来跑去，她与什么人交往，和什么人有密切关系，和什么人好，都瞒不过我们司机。再说，中央干部的司机们也相互认识，直接间接地就知道了很多事情。这位司机对我说，这两个女人可坏了，特别是那个姐姐，净挑拨老干部闹离婚，某某就受过她的挑拨。还有，前几年，一个领导常常和邓觉先跳舞，从来不带自己的夫人，那房子也是那位领导给她找的。这位领导下去了，她又抓住安子文了。这些事情我弄不清楚，也不敢跟别人说，我就跟吴溉之说，要他提醒一下安子文，吴溉之说，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说了也不管用了。我就说，你和安子文这么熟，你为什么不早提醒他？吴溉之说，都是好朋友，这些事情，开始是不好意思说，等到后来，木已成舟，就是说也没有用了。

这时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不久中央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彭真。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她说，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身份的人得到了，这怎么得了？

还有一次，也是三四月间，有一天，邓觉先打电话来，邀我和吴溉之到她那里去打牌，她说已经约好了安子文。我们正要出门，吴溉之的单位打电话来，说中监委要开会。于是，我们就打电话给邓觉先，说去不了了。可随后又接到通知，说会议改期了。我和吴溉之就坐车到邓觉先家里去，没有再通知他们。因为是老熟人，到了邓家，直接就进去了。我们在客厅里等候，就看见安子文、张仲瀚和邓觉先三个人在里面的房间里，对什么东西又捂又盖的，神情很是紧张，还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是不是在一起掩藏什么东西？这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2〕

## 二、聂元梓向康生检举安、邓

当其时，安子文是有妇之夫，邓觉先是有夫之妇，他们俩人的关系，在旁人眼皮底下是否如聂元梓所述般如此暧昧有加，不堪入目？聂所述是否仅为一面之词？今日已难以查证。惟我们知道的是，无论如何，聂元梓已经开始了她自己所称的检举行动了！

聂元梓首先将对安、邓俩人的怀疑，告之密友杨惠文，杨的丈夫白介夫（时任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也从中得知其事。夫妻俩十分紧张，杨劝聂离婚，白非得要将此事报告所在单位中科院的保卫部门，并关照保卫部门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汇报。聂随后又将此事告诉了她认识的老同志郝德青（原中国驻朝鲜大使，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认为，“谢富治怎么好过问这样的事？这种事情，只有康生才能管得了。”聂说康生不好找，郝说，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们学校蹲点嘛，你给她讲一下，转告康生就可以了。（3）

有关向康生检举安、邓的整个过程，聂元梓自己称：

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白介夫又告诉了保卫部门，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我对她说，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曹轶欧问我，是什么事。我简单地说了下情况，她说，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当面讲都未必能说清，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说有关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需要向康生汇报。

曹轶欧把我写的纸条交上去，康生约我去面谈。是曹轶欧传的话。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住在钓鱼台。他们都是晚上办公，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喝了一杯牛奶，就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就是这一次吃夜宵。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康生告诉我，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你还照常到邓觉先那里去，该吃饭就吃饭，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

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正所谓“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我就琢磨着怎么写这个报告。正巧，这时郝德青又来了，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转交给康生了。

我和康生谈话，时间是在‘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前。后来，关于邓觉先这件事，我给康生还写过两个条子。一个条子就是在六月初写的，主要内容是说，毛主席肯定我们的大字报并向全国公布以后，邓觉先给我和吴溉之打过一个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称赞了我一通，说大字报怎么怎么好。另一件事是她到吴溉之这里来，这一次没有打牌了，就是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我以为这是她的最新动向，我的警惕性很高，害怕其中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就向康生报告了。两张条子都是经过曹轶欧传送的。

到了九月份，康生找我去，他说，现在查清楚了，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她还有电台。更多的情况，康生不讲，我不了解，也不能问。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我替吴溉之分辩，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她们来玩来打牌，吴溉之总是先把文件锁起来。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这是党的决定啊！），最好不要隔离，吴溉之年纪大了，一旦隔离起来，恐怕身体承受不了。我和吴溉之分开，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因此，我对吴溉之心里既负疚又无奈。我向康生表态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4）

这里有一个疑问是：曹轶欧等人到北大调查是秘密进行的，当年的资讯也很不发达，郝德青与曹轶欧、康生又都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他怎么会知道曹在北大“蹲点”？笔者推断，曹到北大，应该还是聂告诉郝德青的吧？

在旧版回忆录中，聂元梓称，“在我的记忆中，曹轶欧到北大来的时间比较早，大约是在当年的四月份左右。”“曹轶欧到北大来，到处找人谈话，有一天，曹轶欧派人通知我，要我到专家招待所去见她。曹轶欧告诉我，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问题还是应该继续解决。”故此，聂是知道曹到北大调查而且见过曹的，郝德青却大多不可能知道。

据曹轶欧带领的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负责人之一刘仰峤的回忆，曹轶欧和他是1966年5月14日到北大的，在专家招待所只住过一个晚上，以后就住在西颐宾馆。（5）而《北京大学纪事》一书亦确认曹轶欧等人到北大是在5月14日。（6）

由此可以推断，聂元梓旧版回忆录中有关向康生检举安子文、邓觉先的时间有误，不在1966年4月而应是在当年的5月14日之后。惟检举的举动却确有其事。

### 三、聂元梓检举的后果

1966年8月19日，安子文被“打倒”。据一位参加当晚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大会的中组部干部日记记载：“晚上，到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参加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有陶铸同志、曹轶欧同志（康老的夫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调查组组长）、中监委钱大姐。部的安子文、李楚离、赵汉、帅大姐、乔明甫、陈野萍、杨以希等，和大家一起坐在台下。会场气氛极度紧张。”“在打倒安子文反革命集团的口号声中，陶铸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天的会是很好的大会，是揭盖子的大会。……’‘组织部的问题是严重的，不是一般的工作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你们的问题是党不管党，独立王国，不是一般问题，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曹轶欧和钱瑛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曹轶欧说：‘中组部的盖子揭开了，安子文的问题揭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7）

安子文八月中被打倒，与聂元梓的检举似乎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与聂有关的，是安子文其后的一大罪名——“特务电台发报案”。

在安子文被审查后，从他家里搜出一部曾当作收音机使用的英制旧电台。这是彭真于1948年经贾震送给安子文的。安子文在河北平山南庄和北京解放初期曾当收音机使用过，后因零件严重损坏而搁置。被搜出后经有关部门鉴定，认为零件严重损坏，是不能用来发报的。惟在安子文家搜出此发报机后，中央专案小组编造了一个“特务电台发报案”，牵连涉及与安子文有工作关系的多位高级干部及安的家属，张振汉夫妇全家受到牵连。安子文本人则在其后被正式逮捕，被带上手铐，投进秦城监狱。（8）

1966年8月22日，邓觉先、邓觉慧姐妹俩与张振汉夫妇的儿子、在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工作的张天佑同时被捕，并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各自单独囚禁。12月，原在家中被软禁的张振汉也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

中央专案组认为，张振汉一家（包括邓觉慧）是冒充的一家人，是一群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具体的活动，是利用安子文家的电台，由张天佑进行“特务发报”。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安子文等人被指为“叛徒”。

5月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工作人员时，谈到了安子文与邓觉先等的关系并表扬聂元梓称，“中组部实际上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安子文与一些特务邓觉先，张××（9）、邓觉先的妹妹等人的问题，组织部的同志应该是首先察觉的，但这件事我比你们知道得早，……这件事是聂元梓同志在五月二十五日，她贴第一张大字报以前就告诉我的。据监委的同志说，有人向监委报告过，被钱瑛压住了。同志们想一想那样的一个特务，怎么能自由出入中央组织部？同志们的革命警惕性那里去了！？而且不是一个短时间，从五五年就开始了，已达十一年之久，特务分子在安子文家里如同家庭成员。同志们想一想，难道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我们共产党员的政治警惕性到哪里了？！许多秘密，同志们不知道，安子文却及时迅速地告诉了她们，到底是为什么？这说明对安子文叛徒集团，同志们的揭露，批判做得不够。”（10）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亦表扬聂元梓称，“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功劳：第一张大字报是其中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徒集团。”（11）

10月25日，康生在京西宾馆接见中组部和中监委工作人员时，再次谈及安子文与邓觉先关系及安家中的电台称，“同志们要警惕，安子文不仅是叛徒，混进党内到底干什么？为什么和特务分子那样密切？和邓觉先、邓觉非（慧）那样密切，而且是长期的，就是因为安子文有电台。安子文的电台还由陆定一的弟弟特务陆根一修理过。要警惕，有少数坏人混进来。内蒙王逸伦就是特务。安子文是不是有现行特务活动很值得怀疑，所有的秘密先告诉邓觉先，为什么？”（12）

#### 四、结局

聂元梓在旧版回忆录中有所反思地称：

现在看来，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以及有些事情处理不当，违背组织原则；不太可能有什么政治背景，邓觉先也不可能像康生说的那样是什么英国特务。

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确实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应该反思。其实不止是我一个人，当时杨惠文、白介夫和郝德青也都以为邓觉先是“特务”。在“文革”前夕，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这种氛围里，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搞混了，过分单纯的头脑把事情想得过分复杂了。虽然出发点是保卫党的纯洁性，但造成的后果却是严重的，不但当事人受到过于严厉的惩罚，也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新的波折。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至于康生把这件事情无限扩大，整人，那是我当时始料不及的。

可惜，以上这一段检讨性的语句，在新版回忆录中连同“小家庭骤起大波澜”全章被完全删除了，好像历史上不曾发生过这件事。

现将聂元梓所不了解的张振汉一家后来的有关情况简介如下：

张振汉于1967年5月26日在秦城监狱中病故。邓觉先在被关押审查期间于1971年2月17日病故。张天佑于1969年6月30日结束两年零十个月单独监禁的生活，回到原单位中科院电子学研究所“接受改造”。文革结束后，历任北京新技术应用研究所学

术委员会主任、总工程师，国家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代分离纯化技术实验室主任等职。

1979年11月8日，国家测绘局为邓觉先召开了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大会，局领导在会上宣读的《关于邓觉先同志的平反决定》称：

邓觉先，又名邓道生，女，汉族，1915年生，湖南长沙人，1955年参加革命工作，原国家测绘总局资料员。……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怀疑邓觉先同志有特嫌问题，于1966年8月22日将其逮捕审查。邓觉先同志在被关押审查中，于1971年2月17日病逝。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在1975年5月6日对邓觉先同志的审查结论为蒋匪内政部调查局的特务，混入我内部的特务分子。经复查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对邓觉先同志残酷迫害致死，并作了错误的审查结论。现决定：一、给邓觉先同志平反昭雪，撤销原审查结论，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补发逝世前的工资。二、召开邓觉先同志平反昭雪大会，骨灰盒安放到革命公墓，按规定给家属补发抚恤金，给其原供养的母亲沈裕君发一次性生活补助费。三、邓觉先同志的亲属子女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要按照党的政策改正过来。

国家测绘局

1979年11月8日（13）

据新华社1980年1月31日电，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仇鳌、楚溪春、黄雍、张振汉、康心之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追悼会由王首道主持，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致悼词。悼词说，“张振汉同志是江苏省徐州市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军队师长、指挥等军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工农红军作战被俘，即留在红军中工作，并随军长征到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党组织送回国民党统治区。一九四九年曾为湖南省的和平解放做过一些工作。解放后历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悼词并称张振汉等为“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所贡献的爱国民主人士。”（14）

张振汉邓觉先夫妇泉下有知，应可瞑目矣！

注释：

（1）见张天佑、陈贤庆、黄自荣：《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版，页95—99。

（3）见《聂元梓回忆录》页102。

（4）《聂元梓回忆录》页102—103。

（5）王效挺、黄文一：《对“第一张大字报”〈再考订〉一文的商榷》，载《文史精华》2005年第12期，页19。

（6）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页642。

（7）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自印本），第一卷，页91。彭健飞，时任中组部第五处负责人。

（8）见陈野萍、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版，页196—197。

（9）原文如此，应指张振汉。



- (10) 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一卷，页396—397。  
(11) 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二卷，页571。  
(12) 彭健飞：《十年浩劫日记》第二卷，页624。  
(13) 《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页243—244。  
(14) 《人民日报》1980年2月4日。

□ 原载《记忆》2018年2月15日第213期

~~~~~

## 【往事非烟】

文革秘密准备中——华东局宣传部若干史事记实（选载之一）

• 唐荣智 •

### 前 言

文革秘密准备，指的是毛泽东在1962年9月中共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之后，秘密指使江青到华东局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俞铭璜、夏征农、洪泽展开批判修正主义理论和戏剧革命，直至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公开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指的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提及一九六六年之前的文革秘密准备这四年的史事。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第417页）但是，同样没有写到毛泽东指使江青在华东局秘密酝酿和准备文化革命的真实历史。可以说，至今五十年来国内外研究文革问题始终无人触及这个领域。为什么？因为毛泽东酝酿文化革命，要炮打“司令部”，一开始就绕开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私下指使江青找柯庆施支持。柯庆施又秘密领导俞铭璜组织理论批判，后又要夏征农、洪泽跟着江青搞戏剧革命，这些秘密活动都是口口相传、心照不宣，无会议记录，连华东局宣传部的年度总结和建部大事记都一句话亦不提及。因此，将来即使党中央及华东局在若干年后档案解密公开了，亦不可能有此真相记录。

再从建部历史看吧，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批准成六个中央局。华东局此时方才成立，宣传部临时借衡山宾馆办公。

我是在2月份从上海社科院奉调，全部才10几个干部，部长由石西民兼任，常务副部长为俞铭璜（原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理论处共二人，洪泽为处长，我为干事。处里具体杂事都是洪泽指示我经办的。至1963年3月间江青与柯庆施首先商量文革理论批判事，要俞铭璜跟江青组织文章。俞铭璜领受任务，到理论处与洪泽商量，我亦参与，知道这一过程。因为俞铭璜于年内11月不幸病故，洪泽提升为副部长，随夏征农部长由柯庆施安排跟江青搞戏剧革命。相应增设文艺处，洪泽兼任处长，蒋文杰（原新民晚报总编辑、柯庆施办公室秘书）、吴伟（市委书记石西民夫人、原海燕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任副处长，我由理论处调文艺处，还从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调来四个干事。事隔半个世纪，物是人非，上述一批老部长、处长们都纷纷作古，目前健在的小字辈干事，因为他们是后调入的，唯有我历经早先的理论处、文艺处，从旁参与江青和几位部领导秘密准备文革的一系列活动。因此这

里的历史记忆，唯我独存。今天，我这个当年宣传部的“小字辈”亦已经八十四周岁了。再不提笔，这段鲜为人知的文革秘密准备史就永远淹没了。

一个偶然的机，我与上海社科院研究文革史的金大陆研究员相约，采访并作口述历史记录，由研究生孙路遥、王芳整理，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十期：《“文革”从华东局开始的三件史事》（见本刊zk1311b一编注）。尘封四十多年的文革秘密准备史总算公诸于众。当然这是一篇简约的口述历史，很多具体史实、史料未能全面展示。

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这是拙作实录的座右铭。历史不可遗忘，本书可望为后人研究文革起源提供弥足珍贵的史料，并为本人子孙后代留下一页传记。

作者 2018年1月14日

## 第二章 客人来了

客人，江青也。当年华东局宣传部领导同志都这样尊称她，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这样称呼，大家心照不宣。我们“小字辈”的人知道，亦不问究竟。

### 一、江青找柯老

这次客人来？，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不同寻常。那是在1963年3月间，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俞铭璜和理论处长洪泽二人议论到的事。这两人需要先介绍一下他们的经历和关系，对于这段历史发展的了解有好处。

俞铭璜（1916—1963），生于江苏如皋。中学时组织进步文艺团体“春泥社”，任社长。在《导报》上开辟副刊“春泥”，任主编。1936年进无锡国专求学，在镇江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江苏省学生暑期学生总队训练，后因在上海《永生》周刊上发表《集训散记》，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经叶胥朝奔走营救获释。抗日战争期间组织春泥社剧团，参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鼓动民众抗日。1939年入党，打入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四旅、一旅，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泰州任县委书记。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历任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华中工委宣传部副部长。为新四军中的笔杆子，陈毅赞他为“能说会写的多面手”。所著《新人生观》，鼓励青年走向革命有积极作用。建国后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58年下放南京大学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邀请他在校内作报告，那里的大学教授说：“俞部长作报告，我们出钱买票也要听。”可见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声誉。他于1961年到华东局后，洪泽也随之到华东局宣传部任理论处长。俞、洪之间关系非常密切。

洪泽（1918·1·7—1998·12·19），原名洪绍裘，曾用名洪绍唐、洪澈。浙江宁波人。1936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入党。后被中共江苏省委派往国民党杂牌军特务总队政训处和南通县常备第一大队、抗战支队工作。1939年后历中共江北特委委员、如皋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南通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苏中四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副书记，在反清乡斗争中立功。抗战胜利后任华中第一地委副书记、九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8年因积劳成疾，在大连治疗，与俞铭璜一起疗养。建国后历任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副主任、上海劳动局局长。因肺病复发，转任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后即调华东局宣传部，照顾他身体起见，只是每天上午到部工作。这期间，建部后主要抓二项大事：受中央宣传部委托，组织华东地区编写大学政治理论课教科书

（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筹建华东局理论班。这两项工作都是由俞铭璜领导，洪泽组织实施，因此俞铭璜常在上午到理论处来看望老洪，并讨论工作。当时我在理论处内，洪泽就把具体事务交我落实。俞铭璜叫我“小唐”，布置我做“两脚书橱”，即上班有时间就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尽量记住，大家讨论工作谈到革命导师言论时，能够找到出处，翻出文本来。于是乎我上班就埋头读经典了。

1963年3月初的一天上午，洪泽和我两人照常都在宛平十一号楼下理论处办公室，俞铭璜进来，到南边窗下洪泽办公桌旁坐下对老洪讲：“柯老叫我去，说江青来了，主席意见要批判北京的一些修正主义观点。柯老要我组织人写批判文章。我出了十个题目组织人写文章：有鬼无害论，论海瑞罢官，阶级斗争熄灭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帝王将相论，才子佳人论，写真实论，反火药味论等。我自己写一篇评论有鬼无害的文章。”（大意）

俞铭璜对洪泽的这段重要讲话，当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图。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之后，经过机关内反复学习领会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后，现在组织批判修正主义观点文章是理所当然，因此当时对这件事并没有作什么记录，以后几年中亦没有在部内，包括同洪泽的交谈中，再谈起这件江青交办的往事。到今天，算来55年过去了，实在不能确切记清楚俞铭璜当时讲话的全部内容。但是，这次谈话实在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三年后公开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出的信号弹。为什么？这里可以从对俞铭璜的讲话作具体分析中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江青对柯老到底讲了什么？

自从柯老1964年去世至今54年中，从未见过有介绍或研究柯老的文字中记载江、柯之间这次密谈记录问世。因为是江青带着主席意见找到柯要求支持批判修正主义观点，那么后来江青自己公开场合介绍这段历史的讲话，可以想见她会当面向柯老讲话的大致内容。如：

“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注八）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注九）

以上两段江青讲话，都可印证当时她对柯老讲明为什么要批判修正主义观点，批判些什么，为什么北京攻不开，只能到上海来请求柯老支持，以及柯老也确实叫俞铭璜组织了批判文章，俞铭璜奉命当时写出的《“有鬼无害”论》得到江青的好评就都证明江、柯之间谈话大致内容了。

## 第二，俞铭璜奉命怎么样组织批判文章？

俞铭璜说根据江青、柯老谈话要求，出了十个题目，由他组织人写文章。这完全是单线的、秘密的活动方式，他没有叫理论处长洪泽作为处内工作任务布置下去，也没有向部里报告或者部务会议讨论作为部的一项任务布置下去，直到俞铭璜八个月后因病去世，再也没有人谈及这十个题目批判文章如何落实的情况。唯有俞铭璜自己在这次谈话后努力完成《“有鬼无害”论》之外，还抓了我写作《阶级的产生与消灭》一文。这是因为我在之前的3月12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与复旦大学老师合写的《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一文，他看到了，他从老洪那里讲完后，就走到我办公桌边对我讲：“小唐，你写过阶级的产生，就来写阶级的产生和消灭，要发挥列宁的观点。列宁认为：彻底消灭阶级，不但要剥夺资本家，而且也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他又说：现在我国虽然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建立了公有制，但是，私有思想还存在，人们在生产中社会地位还不平等，在分配环节上干部还有特权，可以多吃多占，因此可能产生新的剥削阶级。从这个历史角度，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大意）“你写出稿子来，我来修改。”当我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写出初稿后就直接交给俞部长了。几天后他到我办公室来找我，说：开始部分他改过了，后面你要按照我的要求自己再修改。于是，我又写第二稿，不久他又来要求再修改。这时他说：

“文章要求不断修改提高。我组织姚文元写海瑞罢官文章，一稿、二稿我都改了，还要他再修改。”他说这几句话，我印象很深，我领会他是教育我，像姚文元这样写作能手，他也要求不断修改的。因此我记忆中，姚文元的海瑞罢官文章，最初是俞铭璜组织、修改的。当我写出自己的第三稿想交给他时，却不见俞部长上班了，问了他的秘书张森昌后，才知他因病住华东医院治疗。我就到医院看望他，只见他坐在病床上，左手捂着肝区，右手执笔改我的文章。我即说：俞部长你安心养病，文章有问题你说一下，让我自己再改。他回答：好吧，你再这样改。我离开后一周，他就因肝癌离世了。可见，俞铭璜在临终前半年多时间里，就是只做江青、柯老交办的组织写作十篇批修文章。他去世后，我就没有再改自己这篇文章，留下俞部长用红色圆珠笔亲笔改过的手稿当纪念品。其他七篇文章是分给谁写的，结果如何，都无人问津。

## 二、文革信号弹

上文已经提到，《“有鬼无害”论》一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通过江青要柯庆施组织批修文章的第一实弹枪。这是有来由的：

据调查，建国初期戏曲工作者学习了戏改方针政策，认识到演出鬼戏会宣扬迷信，毒害人民，因此很少演出鬼戏。1956年文化部在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提出挖掘传统剧目，丰富上演节目，有些文艺工作者就想到让鬼戏登台。1956年下半年上海《新民晚报》就组织讨论鬼戏，发表了30多篇文章，只有极少数人反对鬼戏，大多数人主张演出鬼戏，主要理由是：

认为鬼的观？是“客观存在”。

“应该让这些有反抗性的、有人民性的鬼在舞台上出现”。

对鬼戏和神话应该“一视同仁”，“必须消除对鬼的成见”。

鬼戏中有“很好的表演艺术”，“为了小节去掉艺术不上算”。

现在人民思想有了很大进步，演鬼戏没有什么坏处。

1956年9月7日《河北日报》载文批评鬼戏，坚持唯物论观点，但是被指责为“粗暴”“鲁莽”行为。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南京会见江苏、安徽领导干部，谈及文艺状况，就对舞台上的鬼戏表示相当的反感。他把舞台上出现的妖魔鬼怪一类东西看作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他是想消灭它的。（注十）

及至1961年，北方昆曲剧院演出了孟超改编的《李慧娘》（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孟超发文《试拨丹青涂鬼雄——昆曲李慧娘出版代跋》，说改编此剧目的是“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人生”。文艺评论界热烈赞扬这是“一朵鲜艳的红梅”。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繁星（即廖沫沙，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有鬼无害论》，热烈地为《李慧娘》“作护法”，达到了为鬼戏辩护的高潮。

繁星的文章认为：“戏台上出现鬼神，是因为人的脑子里曾经出现过鬼神的观念，前人的戏曲中有鬼神，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办法可想。”“这类戏，如果把中间的鬼神部分删掉，就根本不成其为戏了。人们说，‘无巧不成书’，这类戏正好是‘无鬼不成戏’。试想《李慧娘》或《红梅记》这出戏，如果在游湖之后，贾似道回家就一把剑把李慧娘砍了，再没有她的阴魂出现，那还有什么戏好看的呢？”“本来是人，死后成鬼的阴魂，当然更是社会斗争的一分子。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作鬼，同时还应该看到她是一个至死不屈的妇女形象。”“文学作品，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李慧娘》所以改编得好，就因为它充分发展了这场斗争，而以鬼辩作为斗争的高潮，胜利地结束斗争。”“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乎戏台上出不出鬼神，而在鬼神所代表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是屈服于压迫势力，还是与压迫势力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前者才是教人屈服于压迫势力的迷信思想，而后者不但不是宣传迷信，恰恰相反，正是对压迫反抗的一种鼓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正是在这样曲折的背景中，俞铭璜开始了艰苦的笔伐。

2013年6月间，我为上述口述历史采访作准备，不意地获得意外的收获。因为华东局宣传部健在的只有几个“小字辈”了。我电话中问询部内文教处的张文香同志，她说当年那段时间里，俞部长经常到办公室来问她看鬼戏的问题，讨论好鬼还是坏鬼。他对文教处长交待，一段时间不要安排张文香工作，因此她就按照俞部长的意见，到上海、苏州等地进剧场买票看戏，看观众的反应，回来向俞部长汇报观感。原来俞部长这样作调查研究，至于他自己在这阶段中有否看报上鬼戏剧目广告而买票看戏，则不得而知。而且俞部长最后写成评有鬼无害的长文章，因为张文香写字端正，就要她抄写全文。此情节时隔50年我才第一次听到。

1963年5月初的一天上午，俞部长又到理论处来。“老洪，我连续几天开夜车，把柯老要写的文章完成了，交给报社了，今天一轻松。”说着他面露笑容，神态飘逸。这个印象，十分深刻，至今难忘，因为我知道他领受这个任务。

5月6—7日两天，《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连续文章。当时我就拜读这篇文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俞部长用此笔名发文。不久，他的秘书张森昌来说：文汇报来稿费单260元（当时我月薪60元），交给俞部长，问为什么用此笔名。俞部长回答璧辉与铭璜词义对称的。部里领导和同志，后来都没有议论这篇文章，没有作为宣传部的一项工作任务而写进总结，连建部大事记都不提一笔。

现在看俞铭璜怎样批繁星有鬼无害论及《李慧娘》鬼戏的：

孟超改编《李慧娘》，并没有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相反的，却发展了糟粕。

对待鬼戏，并不是“没有办法可想”。有些鬼戏我们可以干脆不演；有些鬼戏可以把鬼去掉，例如《十五贯》，本来有鬼的，现在无鬼了，而且也更好看了。

生活在当前国内外火热的斗争中，却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

神话和鬼戏，虽然二者都出于人们迷信鬼神、命运的观念；但是，神话是“人类童话时代”的产物，较多地表现了那时人类的征服自然的幻想，富于勇敢、勤劳的精神和乐观奋斗的气概，无论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或者中国神话中补天的女娲、追日的夸父、移山的愚公，以及后来模拟神话的小说名著《西游记》中的大闹天空的孙行者等等，都是如此。但是，关于鬼的故事、传说，大多数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含有“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所描述的不是“冤魂”，就是“厉鬼”；“冤魂”使得屈辱、悲惨，“厉鬼”使人恐怖。尤其是鬼戏，直接以鬼魂的形象在舞台上“活灵活现”，更加阴森可怕，对人们思想感情的毒害也更大。

最后，这里还可以参照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在柯老健在时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柯老1964年去世后，接柯老位，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在回忆录中写了一节：《“有鬼无害”论》和“梁璧辉”的由来，可以用来对比相关的事实情况：

1，陈丕显认为：“大概是张春桥当时正忙于搞大写十三年，柯庆施便把批判有鬼无害论的任务交给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这里说明陈丕显不知道俞铭璜不仅自己承担批判有鬼无害论任务，还连同组织写十篇文章的任务，是毛泽东、江青想发起批判修正主义观点的第一个战役，而不局限于一篇文章。

2，陈丕显认为：“这是柯庆施直接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俞铭璜只好关起门来搜肠括肚。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令柯庆施满意，于是柯又让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柯庆施要张春桥修改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大加修改”，只有查看原稿才知道修改情况了。

3，陈丕显认为：《“有鬼无害”论》是直接从正面批“鬼戏”《谢瑶环》的。“这把事实搞得张冠李戴了。繁星撰文《有鬼无害论》，第一句话就写：‘看过孟超同志改编的《李慧娘》演出’，怎么变成为批判田汉写的《谢瑶环》呢？”

4，陈丕显认为：“正因为有了这第一枪（指俞文《“有鬼无害”论》一作者注），才会有后来的万箭齐发、万炮齐轰。这真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因此，有些研究文革史的人把这篇文章的发表作为界定文化大革命起始点的一个标志，是有见地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轶事二则

1963年底俞铭璜去世后，他接受江青、柯老交办的组织批修文章的任务，包括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华东局宣传部无人接替。于是江青继续找柯老请求支持，柯老就把组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交给张春桥，这是1964年初的事。从此，华东局宣传部几个部长就不管这

件事了。只是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华东局宣传部与此相关的未公开报道过的二件事，需要记载下来：

一则：1965年11月1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一文后，权威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有这样的记录：“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本来，上海报纸发表的文章，其他地方的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要转载。”（注十二）这里可以补充这样的史实：就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一文发表的当天，华东局宣传部接到党中央来电，说毛主席要华东局通知华东各省报，第二天就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洪泽副部长当即要我用办公室红机子保密电话接通华东六省委宣传部部长。大概10分钟后，江苏省委宣传部欧阳惠林第一个来电话。洪泽对他说：中央通知，今天文汇报上发表的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你们省委的《新华日报》明天要保证登出来。知道吧？哦，明天见报，好。就这样我接通电话，洪泽重复关照，六省电话全部接了，洪泽还要求我：明天到部里阅览室把各省报纸查看一下，各省报是否转载？，在什么版面，写一个简报反映一下。于是我第二天专做这件事，六省都转载了，统计了版面位置，都无编者按语，写了简报交洪泽。他再转夏征农部长，魏文伯书记，上报中央。

二则：夏征农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前半年就看到过原稿，后来在公开发表前，一次在锦江饭店吃饭时，张春桥对夏讲：该文要发表，是中央同意的，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对外不要讲。但是，夏征农不知道这是什么政治问题。1965年11月23日洪泽还专门派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向旭赶赴南京，向夏征农口头汇报了姚文元文章的政治背景。夏征农最初就认为姚文元文章结尾部分“调子太高”，“究竟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政治阴谋，不清楚。”因此，他对宣传部主管的《华东通讯》党刊指出：对于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只作“客观报道”，“介绍各方的意见”，不要刊登政治观点尖锐的文章，提出“贤人”、“清官”、“善人”等学术问题，鼓励大家讨论。

注解：

八，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九，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

十，参见《田汉传》，田本相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199页

十一，同注解十第186页

十二，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8日）

□ 摘自唐荣智：《文革秘密准备中——华东局宣传部若干史事记实》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